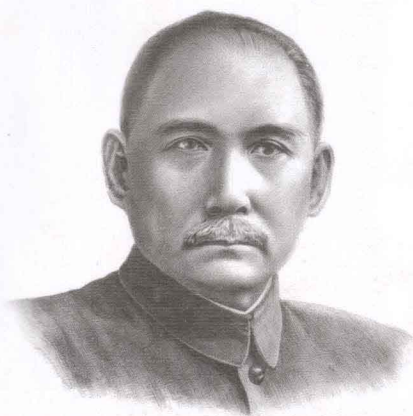




孙中山

国家建设思想研究

SUN ZHONGSHAN GUOJIA JIANSHE SIXIANG YANJIU

■ 林家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本书承广东银达融资担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思聪先生资助出版

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

林家有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 / 林家有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218-08896-9

I. ①孙… II. ①林… III. ①孙中山 (1866 ~ 1925) —国家建设—思想评论 IV. ①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9150 号

SUN ZHONGSHAN GUOJIA JIANSHE SIXIANG YANJIU

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

林家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莹

策 划 编 辑: 卢家明

责 任 编 辑: 王俊辉

封面钢笔画: 白 筑

装 帧 设 计: 张竹媛

责 任 技 编: 周 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8896-9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41.625 字 数: 78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9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4)
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前途	(4)
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4)
孙中山对世情的了解	(23)
在中国“只有革命化，才能近代化”	(45)
二、孙中山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回顾	(58)
孙中山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观的评论	(59)
孙中山对维新派“君主立宪”主张的批评	(69)
孙中山对清末“新政”的态度	(77)
第二章 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产生、形成及其理论架构	(87)
一、孙中山近代化国家建设思想的产生	(87)
比较国内外不同环境，产生改良祖国的愿望	(87)
欧美、日本近代化发展的启迪	(99)
香港、澳门社会发展对孙中山的影响	(128)
二、孙中山近代化国家建设思想的形成	(138)
《上李鸿章书》与改革中国的初步设想	(138)
“振兴中华”与中国的富强	(146)
“三民主义”思想的确立与中国近代化建设思想的形成	(152)
三、孙中山近代化国家建设思想的理论架构	(160)
政体演变与民众的调适	(160)
民主政治与社会的转型	(168)
在共和体制下的经济重构	(175)
人的素质与社会的文明发展	(181)

第三章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模式	(188)
一、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的近代化国家建设模式	(188)
物质层面的变革——洋务新政	(188)
“自强求富”的建设方针	(194)
“中体西用”的文化建设模式	(208)
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近代化国家建设模式	(212)
文化层面的变革——“启蒙与新民”	(212)
由上而下的体制内渐进革新	(220)
君主立宪与社会改良	(226)
三、慈禧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新政”近代化国家建设模式	(234)
清末“新政”的国内外环境	(234)
“新政”期间政治、经济、教育方面的革新措施	(240)
清末“新政”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影响	(246)
四、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近代化国家建设模式	(252)
社会变革必先变心——转换思想	(252)
“以革命开民智”——启蒙与救亡	(260)
改变政制与改变社会——“双改变”模式	(268)
告别皇帝与告别君主专制统治	(276)
第四章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政治的转型	(281)
一、政治民主化思想	(281)
政治民主化思想的核心	(281)
革命的程序与政权建设	(287)
权能区分学说的实质	(298)
中央与地方政权机制	(305)
地方自治学说	(314)
二、政党政治思想	(322)
政党政治思想的演变	(322)

政党的模式与职能	(331)
政党改组与政党联盟	(342)
三、民主法制思想	(34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与政治制度的转型	(348)
人权思想的确立	(355)
“五权宪法”的实质	(368)
国权与民权并重	(377)
国家自由与个人自由	(384)
第五章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	(392)
一、农业近代化建设思想	(392)
提倡科学种田——“治本于农”	(392)
整治水道河渠——“人事补天工”	(399)
实现农业机械化——“耕耨有器”	(405)
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发展与富裕	(408)
二、工业近代化建设思想	(427)
发展以铁路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	(427)
发展“关键及根本工业”与“本部工业”	(434)
三、振兴商业的建设思想	(442)
转变“农本商末”观念	(442)
推行“国政与商政并兴”政策	(446)
“节制资本”与商业发展的误区	(451)
四、重视服务行业的发展思想	(459)
发展中国饮食业	(460)
从学医与行医看孙中山开设医院行善救人的思想	(464)
福利慈善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幸福	(470)
第六章 孙中山与中国的国防建设	(476)
一、没有军就没有权	(476)
依靠会党发不了家	(476)
依靠军阀吃够苦头	(481)

二、学习苏俄 政治建军	(488)
陆军军官学校的创建	(488)
国民党军的建立	(493)
东征的胜利与革命武装的发展	(496)
三、振兴海军 注重海防	(498)
“海军实为富强之基”	(498)
海军与海权	(502)
海军与港口的建设	(505)
四、不能没有航空业和空军	(507)
 第七章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向	(510)
一、在传统与近代之间选择	(510)
对民族文化的认识	(510)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调和主张	(518)
文化的出路——融合与互补	(523)
二、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合一	(528)
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建设同步	(528)
人文精神与科学相互促进	(535)
三、人才的造就	(541)
“学问为立国根本”	(541)
教育与社会的进步	(548)
造就立志做大事的人民公仆	(553)
 第八章 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560)
一、政治体制的演变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560)
从封建帝制到共和政治的变革	(560)
民族国家的构建	(568)
中华民族自觉实体的形成	(586)
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与统一意识的认同	(600)
反抗侵略与维护国家主权观念的树立	(607)
二、城市的建设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612)

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设想	(612)
城市功能结构的变迁	(621)
城市与乡村的相互促进	(626)
三、改造国民性与社会的转型	(631)
提高国民素质，树立社会新风	(631)
加强社会公德意识的建设，实现“天下为公”	(638)
建设高度文明的大同理想社会	(644)
 主要参考文献	 (650)
 后记	 (657)

导 论

孙中山的国家建设思想是他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用他的智慧和缜密的思考，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和富强的理论和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思想、主张和方法，他用实际行动表明，孙中山不仅仅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家，也是一位致力于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思想家和实行家。研究孙中山的建设思想不仅可以丰富学术界对孙中山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评价，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小康社会也具有重大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从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们把从这时发端至1949年新中国诞生止的时期，称为中国的近代时期。由是，近代化建设的课题也就同步被提上议事日程。

近代化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涵盖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和人的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近代化又是一个世界的历史范畴，它是根据世界变革的新认识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总趋势，但是由于近代化产生的内外因素不同，因此人们往往把各国的近代化分为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因而各国通向近代化的道路也不可能一样。由于近代中国的近代化不是在社会生产力发生巨变的条件下导致，亦非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所引发，而是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一场为推销毒品——鸦片，毒害中国人民、获取经济、政治权益的鸦片战争所拉动，所以它同西方的近代化道路迥然不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虽然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但却又以残酷的统治妨碍中国经济和民主的发展，使中国社会在半殖民地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封建主义，始终未能促使中国社会由农业自然经济向工业化和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向共和民主体制的转型，封建的经济和政治，以及观念形态未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形态。封建主义的专制统治同资本

帝国主义相勾结、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统治优势，保持它落后的半封建状态，使其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的附庸。封建主义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资本帝国主义支持中国封建势力竭力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阻碍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所以，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建设进程的两大重要因素。近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所追求的近代化就必然围绕近代中国的基本矛盾——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冲突而展开。首先是追求民族独立，其次是追求社会民主。没有中国的独立和民主这“两件宝贝”，中国的任何事情都办不好。正因为这样，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首先是救亡图存，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其次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社会民主。这是由近代中国的根本国情决定的，中国近代化的任何构想、任何变革方案都不能离开这个历史土壤。中国的近代化必须走自己的路，依据自己的国情与面临的时空环境，来设计切合中国实际的近代化建设蓝图与实施方案。所以，从一开始中国的近代化建设就同西欧、北美的近代化不同。

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不仅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政治家、革命家，也是振兴中华追求中国近代化的伟大先驱。他的近代化建设主张无疑是他那个时代中各种有关方案中最优秀的构想。孙中山关于中国近代化建设的理论架构，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他关于中国近代化发展道路的模式、特色，以及他对西方近代化的考察和思考、对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反思，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百年来，我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将中国由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转换为工商业发达，农业先进，文明发达的近代社会，经过曲折的斗争和艰苦的探索。从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还有清末统治阶级推行的“新政”，都提出或设计过近代化建设的主张和方案，都起过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上述各种各样的近代化建设主张和方案，不是“以夏变夷”，就是“以夷变夏”，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或者“全盘西化”。具体历史条件，包括思想上的局限，使中国未能选择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近代化建设方案，又由于承担近代化进程中的阶级、社团、政党的软弱，未能扫除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两大近代化的障碍，因此贻误了中国实现国

家建设的时机，但我们也不能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历史和前人的实践。我们应该接受前人在近代化建设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和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去对待前人的探索，一切肯定或一切否定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观点和认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条件下，总结我们的前辈在近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案，总结他们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可作为我们的借鉴，使我们聪明一些，思维开阔一些，会使我们更加有信心地沿着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去建设我们的国家，振兴我们的民族。

前些年在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只有唯一的一条，那就是中国只能按西方的足迹亦步亦趋而不能跳跃式地发展，这些人认为，近代中国的出路只能有唯一的一个——彻头彻尾地西化、“全盘西化”；还有人认为，孙中山的革命实践破坏了清末的“新政”，阻碍了中国近代发展的进程，说什么“辛亥革命弊多利少”，指责孙中山预防西方两极分化的理论是把中国近代化国家建设引入“误区”，不一而足。本书研究的着眼点，是从孙中山对西方和中国发展道路的思考、反思开始，具体地剖析中国近代国家发展各种模式及其失败的社会条件，重点探索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的渊源、理论架构，以及他谋求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文明等方面所从事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他“只有革命化，才能实现近代化”的思想主张追踪溯源，从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教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借鉴。

第一章

孙中山对近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

一、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前途

孙中山对中国国情的认识

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明了国情，把握国情，非常重要。如果离开国情，盲目地引进外国的思想理论，采取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策略和路线，革命必然会失败；如果离开中国国情，盲目地借用别国的建国、治国经验，不能为我所用，甚至错误地吸纳外国理念、思想和文化，借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经验，经济和社会的建设也必然会造成失误，国家也必然会陷入困境。这是为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孙中山深知其中的道理，所以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非常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把正确掌握国情列为办事之首，为此大声疾呼并广为宣传。孙中山反复强调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国的近代化都要“务求适合于国力之发展”。他认为中国之发展既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又不能重走西方人走过的老路。他根据国情确立革命志向，又根据国情提出建国方略，这正是他高明之处。

何谓国情？国情即国家的舆地情况、人文环境、历史和现实。它包含地理、人口、资源等自然条件，也包括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科学文化教育的情况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社会条件。所以，国情极为复杂。国情的复杂，一

方面表现为，一个国家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多样性，其发展水平不平衡，同时各方面的问题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省情、市情、县情和各单位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懂得了研究国情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已经把握了国情，也不等于就真正认识了国情。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国情，必须注意全面性、系统性。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国情不同，治理国家、建设国家所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方法也不同。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要建设中国，实现中国的近代化就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强国之路，盲目地照搬别国的现成经验，或者对外国的经验采取一概排拒的态度都是不对的。所以近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历史各方面的情况，得出必须以“救亡图存”作为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宣传和鼓动国民起来反帝反封建，“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化国家的结论，这是经过中国无数人的努力、付出无数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经验。

伟大的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先驱孙中山对中国国情进行了非常认真而艰苦的探索，但由于他长期远离祖国，漂泊、流徙于世界各地，因此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既有正确的方面，又有不全面和不系统的方面。同时，由于孙中山了解国情首先是从乡情，进而探索世情（即世界情况），最后力求了解和认识国情，所以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是放在世界范围去考察，具有明显的对比性。从方法上看，孙中山是从现在看过去，又从历史联系现在，所以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给人以清楚明白的古今观照。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孙中山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过辉煌过去，必然也会有美好的未来。

中国“地大”是指它不仅拥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陆地，还有面积约为32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1/3的海洋。中国“物博”是指地下资源丰富，拥有大量的煤、铁及其他有色金属，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量也很大。这是我们国家的优势。孙中山说过，我们生长在这个广阔的国土里实在是幸运。中国“人口众多”，孙中山说是“四万万五千万”，也说是“四万万”。“而蒙古人不过百万，满人二三百万，并藏民五百万，及别族总共不

过一千一百万”，^① 汉族占中国国民的大多数。孙中山认为：“以我们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四百二十七万方米之土地（较之日本前有土地不过十四万方余米，今有土地亦不过二十六万方米耳），为世界独一无二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②

人多固然是一大优势，但也是我们的巨大负担。人多了不仅“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缺乏生存空间，而且我国的情况是西北部地大，而人口却集中在中部和东南部。“地大”如果交通不发达，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阻隔，人的生存就困难。人多了可利用的资源有限，便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孙中山当然不可能全面地认识中国地缘生态等诸多因素对中国发展经济的制约。所以，他指出：中国的贫穷落后不是中国的自然条件或别的什么原因在制约，而主要是政治因素所造成。他说我们中国“蹉跎岁月，寸功不展，使此绝好山河仍为异族所据，至今无有能光复”，是因为中国人墨守成规，因循守旧，“误于从前不变”。正由于“中国从前之不变”，致使人们不了解改革之必要，“以为我中国的文明极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因此，孙中山强调，中国必须通过人的因素来加速中国的进步。他认为，中国首先要改革，其次要变法。他肯定地说：倘若中国如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美）国还要强几分的”。何以见得？孙中山说，因为美国无此好基础，就是西欧的英、法、德、意和亚洲的日本就地缘关系看也不能与中国相比。他说：

日本不过我中国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跃而为头等强国；米国土地虽有清国版图之大，而人口不过几千万，于今米人极强，即欧人亦畏之；英国不过区区海上三岛，其余都是星散的属地；德、法、意诸国虽强于欧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国；俄现被挫于日本，土地虽大于我，人口终不如我。^③

① 孙中山：《在香港与〈南清早报〉记者威路臣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88页。

②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③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卷，第279页。

孙中山说,“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可是沉默忍隐,使我们中国这“一片好山河”,未能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之牛耳,实为可叹!而此中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国人不能将“过代之文明变而为近世的文明”,只能在古代传承下来的文明中重复再重复,没有创新,没有大的发展,因此极大地禁锢着人们的思维,养成保守习气,造成人们往后看,而不是往前看。所以,孙中山指出,“中国不过误于从前不变”,如果现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新的价值观和人文意识,下定决心“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孙中山又指出:从前我们误于说中国4000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和民族事业的发展;现在人们已经晓得要改革,要取法于人。然而,取法于人,取法什么?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孙中山指出: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去审视未来,因为人类社会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但我们不能消极地随天演的自然的变更,一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他进一步说,要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要了解世界的进步和真文明;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科学、技术来救我们中国,“万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②

近30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迅速发展,相比之下,中国落后了。到19世纪中期,中国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侵侮、掠夺,他认为,当时遭到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救亡图存”成为全民族的严重问题。从国力上比,中国不如西方列强和东方日本;从科学技术上比,中国较之西方更是相形见绌。但孙中山没有颓丧,他对中国的未来仍然充满希望。他认为,“对此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帝国”——中国,“每一精明的观察者,都认为它是一个前程远大的国家”。所以,他指出,要将中国由一个旧时代引入近代进步时代,最重要的是应该重视和参与唤醒中国民众的工作,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倘能使中国人民认识到自己

①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

② 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1—282页。

的力量和资源并对其加以适当利用，则中国将来定能成为最大的强国”。^①他充满自信地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②

同时，孙中山非常重视历史的传承，但也非常强调文明共享、文化交融。

继承中国的历史遗产，既是一种推动力，又是一种沉重的负担。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很深，春秋大义，大一统意识，强权政治，惟上惟书观念，以及固有的传统道德、功利主义对国人的影响都非常之深巨。所以，每一个政治家考虑治理中国的问题时都不能忽视这个实际。一概否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将会产生思想的断裂和民族虚无主义，造成民族的自卑和思想的疏离；不加分析地肯定传统文化的一切，也势必会造成民族的妄自尊大和民族文化的封闭，与时代隔绝，与日益飞速发展的世界相脱离。为此，正确地认识我们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是中国每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必须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孙中山指出：“自古制器尚象，开物成务，中国实在各国之先。而创作之物，大有助于世界文明之进步者，不一而足。如印刷版也，火药也，瓷器也，丝茶也，皆为人类所需要者也。更有一物，实开今日世界交通之盛运，成今日全球一家之局者，厥为罗经。古籍所载指南车，有谓创于黄帝者，有谓创于周公者，莫衷一是。然中国发明磁石性质而制为指南针，由来甚古，可无疑义。后人仿而用之，航海事业于以发达。”^③总之，中国有史以来，文明发达之迹，其事昭然若揭，其进步之速也为世界所无，可是近世以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相较望尘莫及，较之日本亦见逊色，这是“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是结果。

① 孙中山：《致麦格雷戈夫人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5页。

②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③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

中国传统文化曾经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成果，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正如被人们誉为量子力学之父的中国台湾吴大猷先生所指出的，“古代中国赢过西方的是技术不是科学”。他认为，“中国历史的科技发明，如蚕丝、铜器的制造，都早于西方，历史学家一定可以列出很多发明事实，证明中国的科技发展在过去是优于西方的，但是大家陶醉于这些成就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些领先都只是技术而已，中国长久以来就缺乏科学思想的扎根与探求”。他表示：“科学与技术不能混为一谈，过去中国所超前西方世界的，其实只是技术。由于对科学与科技的分际认识不清，以致科学思想的扎根工作长期被忽略了，这才是中国长久以来科学发展不及西方的原因。”^①

这只是说，中国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不足，中国的文化应随时吸取国外的文化成就作为本国文化的补充。吸取外来的科学和先进的技术对于中国进步发展是有益的。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是中国的世界，所以谁也离不开谁，在世界范围内，国与国之间应该相互同情和支持，通过文化的交流增加共识，共同进步，共同发展。1904年8月孙中山用英文写作，在美国发表了一篇文章“*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 An Appeal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译成中文题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在这一重要文章中，孙中山就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说明。他写道：

西方人中有一种普遍的误会，以为中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从远古直到清朝的建立，中国人一直与邻国保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外国商人与教士从没有丝毫恶意歧视。西安府的景教碑提供我们一个绝妙的记录，说明早在公元第七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当地人民间进行了传播福音的工作。再者，佛教乃是汉朝皇帝传入中国的，人民以很大的热情欢迎这个新宗教，此

① 参见《古代中国赢过西方是技术不是科学》，《团结报》1996年8月10日。